图 1.3　容闳

厂”“马尾造船厂”等。而这一切都急需人才！尽管聘请了一些洋教习，但清廷清楚还需要更多自己的人才。于是在洋务教育中，罕见地出现了派遣留学生一项。而提出这个建议和积极推动它成行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容闳（图 1.3）。人们习惯把容闳看作中国留学运动的鼻祖。尽管早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类留学生——如前文所述，但那多半是自发行为（如西去天竺取经）或是经由外国传教士的引导（留欧进修道院学神学）。作为由政府出面组织，规模性地派遣学子留学外国的行动，容闳倡导的幼童留美确实是首次，故我们把幼童留美视为中国第一次留学潮。

2. 容闳首倡幼童留美

很多人都熟悉容闳这个名字，并且或多或少知道些关于他及留美幼童的事迹；故在此不想多述，我们仅提及第一次留学潮中的几个关键之处。

容闳是这次计划的最早倡议人，其后才被曾国藩及李鸿章接受并实施。不容忽视的是容闳本人就是留美归来的早期留学生。他于 1828 年 11 月出生于广东香山县，自幼因家贫上不起私塾，被父亲送进美国人办的免费的澳门教会小学读书，后该校倒闭而改进玛礼孙教会学校，由此可知容闳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完全是英文教育。1847 年，当他的美国老师（也是该校校长）勃朗先生（Rev. Samuel Robbins Brown）回国时，19 岁的容闳随同他，经好望角及大西洋前往美国纽约。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勃朗先生家住新英格兰的康州，他把容闳和同行的另外两个中国学生带到了新英格兰，送进位于麻省的孟松学校（Monson Academy）求学。孟松学校是当时新英格兰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，校长海门也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，颇有英国文学造诣。容闳自从求学以来接触到的两位校长都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，这对他有很大影响，所以当容闳从孟松学校毕业后，也进入耶鲁大学。

容闳是当时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，他感到孤独和忧心：一是惦记家中老母及三个姐弟，二是怕忘记中国文化。他写信给家乡的卫三畏牧师，请他帮忙购买中文书籍及中国阴历年历，后来他的日记都注明公元日期及中国阴历年月日。他进到美国顶尖大学读书殊非容易，要赶一些他不熟悉的课程（尤其困扰他的是微积分），还要为筹备学费而担任伙食团的司务长兼兄弟会图书室的管理员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让容闳终于能拿到足够学分毕业的不是其他科目，竟然是他的英文。这得益于他从 7 岁入学就开始念英文，他在耶鲁大学两次因英文作文比赛获第一名，这不仅让他平均成绩大大提升，还让师生对这个来自遥远的东方的学生刮目相看。[5]

1854 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，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。说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不妥，因为之前尚有一些中国人来美求学；但是说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学生还是恰如其分。这是容闳和早期赴欧的那些留学生的不同之处，早期留欧学生主要身处闭塞的神学院学神学，而容闳却身处自由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，毕业于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耶鲁大学。在美国八年里，容闳领悟到："西学可以使中国复兴、开明和强盛"，并立志践行"我所享受的教育权利，下一代的同胞也应该同样地享受"[6]。容闳的一生都在努力实现他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。尽管他在大学期间（1852 年）就加入了美国籍，可是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自幼出生后成长的中国（我们注意到，容闳赴美时已经 19 岁），大学毕业后，为了实现他的理想，26 岁的容闳毅然回到中国。

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的容闳，又从原路经好望角回到香港。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定都金陵（南京），国内战乱频仍，两广总督叶名琛借镇压暴乱，杀人无数。容闳回国后看到的是太平天国横空出世后动荡不定的祖国，他感到心悸又焦虑，一心想让自己国家强盛起来，走上现代化之路。可惜现实和想象相差太远，清廷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耶鲁、什么是哈佛，他们只认状元、进士。容闳连秀才都不是，中文写得没英文好，满腹抱负的他发现报国无门，有力无处使，求职都难。无奈中容闳竟寄希望于太平天国，因为听说他们信基督、禁鸦片、废除妇女缠脚，遂幻想笃信基督教的洪秀全会给中国带来复兴与希望。

为了一探真情，他冒险与英国茶商乘船秘密来到太平军所辖金陵城，见到了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，大胆地提出了关于军队、政府及教

育三大改革建议。干王以战事频繁为借口，婉拒容闳建议；反之对这位从“花旗国”回来的勇敢来访者，大方地授予他太平军四等爵位，及一枚刻有“容闳”二字的印章。容闳失望而归，尽管他和同行的英国茶商一起，把被扣留在太平天国地区的大量茶叶运到上海挣了一笔钱，很快致富；可是当个富商并不是他的愿望。他报效祖国之心未泯，他在继续寻找机会。

从太平天国回来的容闳知道唯有现实一点，在当时朝廷里寻找机会。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留学计划和中国现代化远景。无望中容闳偶然得到中国数学家李善兰的推荐，收到朝中开明派重臣曾国藩的请帖，被请进他在安庆的大本营。容闳惴惴不安地前来晋见这位“两江总督”，万万没想到总督谈的竟是他日思夜想的中国现代化大计。当容闳得知曾国藩想要他做的事是到美国购买机器设备，以筹建上海兵工厂及造船厂，意识到此时提及他的教育计划不合时宜，不过曾国藩要建的这个工厂不仅要制造枪炮，还要造轮船，甚至要附设翻译馆，这也是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，容闳不禁暗喜。此时清廷因鸦片战争面临“陌生的技术”的入侵，在“欲迎还拒”心态下，被迫面对现实。正如李鸿章在上书中所述：洋人“其大炮之精纯，子药之细巧，器械之鲜明，队伍之雄伟，实非中国所能及。其陆军虽非所长，而每攻城劫营，各项军火，皆中土所无”。故清廷终于迈出了器物层次的现代化——建工厂。

容闳庆幸终于有机会为国效劳，哪怕是买机器、造工厂；他把心中的教育计划悄悄地暂放一边，回到美国为清廷接洽购买机器事宜。在麻省等待交货期间，他还回到母校耶鲁一访。当时美国内战正酣，他不忘自己也是美国公民，特地到华盛顿表示愿意加入联邦军队服役，尽一个美国公民的职责。美国军方得知这个英文说得很漂亮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籍中国人此行另负重任，遂婉拒了他的入伍愿望，督促他尽快完成中国政府交付的任务。

次年容闳押运所购机器回到中国。使用这批机器装备的工厂就是“江南制造总局”，即后来的“江南造船厂”。尽管该厂初期造军火远多于造船舶，不过它所附设的翻译馆倒是颇有建树，其领军人物就是著名的美国人傅兰雅。该馆翻译了众多早期对中国起重要作用的书籍。容闳还大胆地建议在江南制造局里附设兵工学校，他称这是对自己心中的教育计划“小试其锋”。在这次以“开铁矿，制船炮”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第

一阶段，容闳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，做了一点尝试，尽管这远不是他的抱负和终极目标。经曾国藩力荐，容闳因圆满完成赴美采购机器任务而被授予五品官职，在九品官职行列中，也算是个中级干部了；并在“上海道”担任译员。自此他有了正统官品，可以正式在朝廷上身穿朝服办事。相信此时穿上绣饰长袍和戴上饰有孔雀翎帽子的容闳，心中想的仍是此番穿戴可否使我的留学教育计划又进一步。

1870 年容闳参与处理天津教案，在和法国人谈判中，充当丁日昌的译员，充分展露了他的英语水平及谈判能力，获得丁的好感。而一起办案的同僚们，经容闳游说，也都支持他的留学计划，于是容闳终于大胆向清朝政府提出了自己的“条陈四则”：

其一，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，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，不许外人为股东，即公司中经理、职员，也概用中国人。

其二，政府宜派选颖秀青年，送之出洋留学，以为国家储蓄人才。

其三，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。

其四，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，以防外力之侵入。

容闳自己在他的《西学东渐记》中流露：“此陈条之第一、三、四，特假以陪衬，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，自在第二条。”容闳自称“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，偶因公事谒丁抚，必强聒不已，并恳其常向曾督言此，以免日久淡忘”。[7] 上述“丁抚”即丁日昌。

当时适值中美签订了《蒲安臣条约》，两国人民往来可以按最惠国对待。清廷得知容闳留学计划中的留学生有可能进入美国官办学校，包括两所军事院校——西点军校（West Point）和海军学院（Naval Academy）后，开始考虑留学计划；在丁日昌向曾国藩、李鸿章极力推荐之下，最终得清廷批准。曾国藩和李鸿章对此颇为自豪地说：“幼童出洋肄业，固属中华创始之举，抑亦古来未有之事！”尽管双方当时想得并不一样——官方想要培养的是能绘图、测量、航海、造船和机械、兵工等学科之人才，他们希望自己工厂不要仰仗外国人，要有自己懂技术的官员；而容闳想的是要培养有深厚西方文明基础的人，因为他相信西方之所以获胜，不是仅仅依靠船坚炮利，而是背后的一整套东西，这些需要经长期文化熏陶方可获得。

正是基于此思维，容闳提出的留学计划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（1）这是首次政府官派留学——留学需要大量资金支持，唯有靠

政府。

（2）留学期限长达十五年——容闳希望这批留学生不止学到一点技艺，而是能接受全面的西方教育。

（3）选派的是十二至十五岁的幼童——待学成之日，正是为国服务之时。

（4）留学国度为美国——除了有容闳个人极力推荐的作用，政治环境也正赶上“天时”——1868 年中美签订了《蒲安臣条约》，该条约的第七条即明文规定“两国人民往来游学，照最优之国优待……”

图 1.4　蒲安臣

《蒲安臣条约》是以美国人蒲安臣（Anson Burlingame，图 1.4）名字命名的一个平等的中美条约。在此我不妨多言几句此人，因为幼童留美终于成行的大气候要归功于此条约及此人。

3. 蒲安臣，一位出任中国全权使节的美国人

蒲安臣先生是一位自由与平等精神的捍卫者，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，1853 年出任麻省参议员。早在美国农奴制盛行时代，他就是反对蓄奴的急先锋，1856 年发表著名的《马萨诸塞州的抗辩》这一美国解放黑奴的重要文献。他和林肯总统私交甚好。林肯就任总统后，任命他为第十三任美国驻华公使（美国早在 1843 年开始就有驻大清国专员）。遗憾的是中国到此时，竟然还没有一位驻外使节；可是自鸦片战争后，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事情越来越多——不管是大清帝国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事务——由于没有自己的外交官员，连起码通晓国际规则和西方语言的外交人才都没有（像容闳这样可堪重用的人又不受清廷信任），屡屡吃亏受挫。

蒲安臣自 1862 年 6 月到中国，在中国任职的六年中，他始终强调对华“合作政策”，提倡以“公正的”外交活动取代“武力外交”。而当时的其他国家，包括英、法、俄、德等国，无不对华专横霸道，于是清廷对这